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永和九年
于會稽山陰
也羣賢畢至少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一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此之盛

20世纪

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

ERSHI SHIJI ZHONGGUO SHUXUE YIGU KAOBIAN ZHI YANJIU

徐清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
世纪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

ERSHI SHIJI ZHONGGUO SHUXUE YIGU KAObIAN ZHI YANJIU

徐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 / 徐清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213-04119-8

I .2… II.徐… III.汉字—书法—研究
IV.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831 号

书 名	20 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
作 者	徐 清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洪 晓
责任校对	张谷年
电脑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6.6 万
插 页	1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119-8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陈振濂

徐清的博士论文《20 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在经过几度修改后即将付梓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对这篇论文能及时发表有着由衷的期盼与赞许。

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自 2000 年成立以来，风风雨雨八年间，培养出了几十位博士、博士后。而由研究所成立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术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我们培养高端人才的一些理想、要求不被稀释与泛化。在目前学术大量掺水、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的大环境下，在谋求学位名号大于实践学术理想的氛围中，我们严格要求每一位入读的博、硕士研究生必须端正态度，攻读学位不应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应是立足于为学术献身的人生信仰与目标的理由。我经常告诫同学们的一句话是：请共同为我们保存一块学术净土与绿洲。为了这个也许是十分空洞与苍白无力的理想与信念，我们反复提醒学生“学术是有尊严的”。不允许拿学术做交易；不容忍学生以学问为跳板去换取眼前的功名利禄。八年多来，在以“个人课题”、“集体课题”、“社会课题”三者交织起来的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术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下，几十位博、硕士研究生潜心学术，努力探索，为浙江大学的美术史、书法史研究创建了一些极好的品牌，如最有影响的“近现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西泠印社史研究”、“书法学学科研究”、“两

宋绘画研究”等,我们的学生也以良好的学术素养、严谨的学术作风,在行内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徐清博士入学之时,正是中国艺术研究所草创之初。草路蓝缕,新立制度,她应该是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当然也是共同缔造者之一。徐清迅速进入角色,成为在中国艺术研究所中学习最认真、对学术理想最坚持的学生之一。平时言辞不多的徐清,却是在学习中最肯动脑筋,讨论问题也最深入的一位。此外,在研究所很多新入学的年轻学子面前,她也是一位性格不事张扬,能默默完成老师交待任务的“师姐”。我认为,正是这种不事张扬的低调性格,促成了徐清在学术上肯钻研、肯动脑子,又能在团队中起核心作用。在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各种不同知识背景与性格类型的学生(如有美院出身的、有综合性大学历史专业出身的、有外语专业的、有古典文献专业的……)相聚在一起,必然会在思想上、思维方式上,乃至治学理念上,甚至在对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的不同理解上,产生诸多差距。在这时,能沉下心来默默承担起一个团队核心角色的“资深”学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要具备很好的学术能力——不然大家在专业上未必会服气,恐怕还得有很好的协调、融和、平衡的“情商”,不能遇事只打自己个人的小算盘,得有遇事能为大家着想,谦让的素质。应该说,创所之时,徐清的确在这些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在一次课堂讨论之后,徐清告诉我她对100年来书法界的“疑古”思潮很感兴趣。这让我着实眼睛一亮。从我年轻时钻研学问起,我即对胡适,尤其是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派”即“古史辨派”的学术思路痴迷不已。尽管在过去顾颉刚先生的学说一直遭许多人诟病与批判:从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之的不以为然到5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正统史学笼罩下的被边缘化;再到80年代后许多人以考古新成果来否定顾先生当年的部分结论;乃至在徐清

提出书法史百年疑古思潮的 21 世纪初,还有许多著名学者认为“疑古学派”早已破产,应该走向“释古时代”……但我却一直坚持认为:顾先生的努力,含有对中国古史探索的许多规律性内容;他的具体个别结论不可靠,并不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的必然不可靠。或许正相反,在近代倡导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来,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各家各派史学成就的映照下,顾颉刚的史学是其中思想张力最大,因此也是最令人震撼与着迷的一个类型。在前几年中国书画篆刻史学的博士生考试中,我曾以此为题要求专攻书画篆刻史学的考生们认真回答这一对中国近代历史学学派特征进行区别分析的大历史问题。我认为:“疑古”其实包含了创新的各种可能性。它是创新必需的前提。就学问而言,只要不“疑”,就不会有什么创新。

更进而论之,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能力,即是从人人看似平常的传统中看不平常来。按我们的说法,即先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不是每个学者都有能力或有机遇去解决问题的,但每个学者都应有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是“疑古”之“疑”,看什么都对,都正常,都不“疑”,要学问做什么?我平时在课堂里与博士生一起讨论学术时,会反复追问:“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认为呢?”不仅仅以收集资料为满足,不仅仅以介绍事实为满足,而是不断追问,必欲穷尽而后止。其实要训练博士生的,正是这个“疑”的能力——在别人看来,一切都正常无疑;但在高手看来,正常中会有异常、有反常,正常中会有破绽、有漏洞,“疑”正是从此而生。一个学者能随时敏锐地“疑”,还能言之成理,这样的学者才是优秀的——即使最后解决问题的不是他,但他仍然是优秀的。看顾颉刚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如是,看我们的博硕士研究生亦如是。

徐清以 20 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为题作史的研究,正可被置于此一认识背景中加以定位。一方面,她选的题目本身即是疑古之研究,这正是一个最“切题”的选择;另一方面,她研究的书法疑古史,自己所持的立场,也是“疑”。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是立足于这一学术思想之根本。这就使得这篇论文从一起步,即有了一种在学术上占领先机的优势。我曾经提醒过她:“疑古”与“考辨”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放在一起论述是否会互相妨碍——疑古是对历史事实提出学术问号;而考辨则是对之提出自己的解答。这“问”与“答”未必每个个案皆全具备之,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两者之间要达到一种关系的平衡,很难。徐清的回答却是:希望在“问”与“答”之中全面展示 100 年来书法史研究的课题内容序列与含义;究竟哪些能构成课题;哪些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哪些已有疑古之实但却构不成焦点;为什么成不了焦点……这样的百年史,是生趣盎然的、生机勃勃的。最后,我认可了她的选择,并且我以为:这样经过认真斟酌论证之后的目标选择,必然是不盲目的、有理性力量支撑的,因此也是有成功率的。

徐清的这篇博士论文,是我指导的几十篇博士论文中最轻松,也最有趣味的一篇。在反复切磋辩难过程中,我们师生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疑古”与“考辨”等大量的事实与含义上。我每次的圈阅、批注与评价甚至是一些反面意见,与她每次的把握、说明乃至抗辩,都饶有学术深度。而且,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博士论文指导的经验和过程,我对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的治所理念才从朦胧到清晰、从含混到明确。首先,学生来读书必须有献身学术的决心,不是拿学问、学位做敲门砖去谋其他世俗东西;用现在的说法,是“不计利害”。其次,学生最重要的学术素质是“提出问题”,具备质疑精神,能独立思考。收集史料是基本功而不是目的,一篇论文,导师最关心的是“创新点”,是有什么迥异于时流

的新见解。这两点,在徐清那一代博士生的学习生涯中,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徐清的这篇论文,在经过修改、补充之后,要公开出版了。作为她的导师,我非常有成就感。她的努力,代表了浙江大学艺术学博、硕士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在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之后,她曾以此为题在全国书学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并发言。此外,在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上,她又因提倡“篆刻文献学”而广受与会代表关注。这表明,她的学术状态还很好,没有因为毕业几年而渐渐缓慢与平淡,还有很明显的激情与冲劲。我希望她能可持久地“前行”,在学术上不断有所作为,体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夫与敏锐的思辩能力。这一素质,是新一代学术人才所必不可少的。

2009年1月26日(大年初一)

于浙江大学

目 录

序	陈振濂(1)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5)
第一节 概念界说和研究现状	(5)
第二节 历史渊源:传统书学中的疑古辨伪	(8)
一、对古代书法文献的疑辨	(9)
二、对古代书迹的疑辨	(12)
三、对古代书体史、书风史的疑辨	(14)
第三节 时代条件:20 世纪中国新思想新学术的影响	(15)
一、“科学主义”、“整理国故”与书学反思	(16)
二、新学术新学科与书学疑古考辨	(29)
第二章 古代书法文献真伪与年代之辨	(44)
第一节 20 世纪前半期的疑辨	(45)
一、30 年代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之书法文献辨伪	(45)
二、40 年代唐耕余“《笔阵图》真伪及时代之辨”	(55)
第二节 20 世纪后半期的疑辨	(61)
一、80 年代李天马编述《余氏书录辨伪》及徐邦达辨王愔《文字志》	(62)

二、90年代以后张天弓疑辨先唐书法文献·····	(65)
第三章 古代书迹真伪与年代之辨 ·····	(72)
第一节 《石鼓文》之辨·····	(72)
一、20世纪之前对于《石鼓文》年代与书体的认识·····	(72)
二、20世纪书家、学者之辨驳·····	(78)
第二节 传蔡邕所书汉碑之辨·····	(89)
一、20世纪之前关于蔡邕书碑的记载·····	(89)
二、20世纪书家、学者之疑辨·····	(93)
第三节 《兰亭序》之辨·····	(99)
一、20世纪之前关于《兰亭序》的记载和认识·····	(99)
二、20世纪的《兰亭序》之辨·····	(101)
第四节 其他书迹的疑辨·····	(119)
一、《自叙帖》之辨·····	(119)
二、《平复帖》之辨·····	(129)
三、《曹娥碑》墨迹之辨·····	(133)
四、《古诗四帖》之辨·····	(136)
五、《裴将军诗》之辨·····	(142)
第四章 书体发展史之辨 ·····	(146)
第一节 篆书起源与发展之辨·····	(146)
一、对于篆书起源与发展的传统认知·····	(146)
二、20世纪书家、学者之疑辨·····	(147)
第二节 隶书起源与发展之辨·····	(159)
一、对于隶书起源与发展的传统认知·····	(159)
二、20世纪关于“隶书之起源”的疑辨·····	(160)
三、20世纪关于“隶书之成熟”的疑辨·····	(176)
第三节 草书起源与发展之辨·····	(184)
一、对于草书起源与发展的传统认知·····	(184)

二、20 世纪关于“草书之起源”的疑辨	(187)
三、20 世纪关于“草书之发展成熟”的疑辨	(197)
第五章 结论	(202)
第一节 20 世纪书学疑辨的历史意义	(202)
一、“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思想启蒙意义 ...	(202)
二、新的认识起点和研究思路——学术深化意义 ...	(203)
第二节 20 世纪书学疑辨存在的问题和遗憾	(205)
一、书学疑辨本身存在的问题	(205)
二、书学界对书学疑辨的忽视	(206)
第三节 20 世纪书学疑辨给予当下与未来的启示	(208)
主要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1)
再记	(222)

前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20 世纪中国书法史”作为一个颇具价值的新课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不少著述已就 20 世纪中国书法的大致轮廓进行了梳理,对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研究、书法教育、书法社团及活动方式、中外交流等诸多内容加以探讨^①,进而将 20 世纪书法史视为“一个由古典形态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②。但是,大多数著述是以通论的形式对百年书法史作面面俱到式的论述,以 20 世纪书法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而言,目前的研究开展得还很不够,我们对于这个转变过程、对于其中的波折曲回尚未十分清楚(或者“20 世纪书法史是由古典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这一结论本身即是一个待证的命题),因此仍需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对这百

① 参见陈振濂师:《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朱仁夫:《中国现代书法史(1848—90 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卢辅圣:《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鸟瞰》,《文艺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102—110 页;周俊杰:《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前期、中期、后期)》,《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选取这 100 年中的部分时段作研究的著述有:孙洵:《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周俊杰:《当代书法艺术论》(其中有“当代书法史论纲(1949—1993)”),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陈振濂师:《民国书法史论》,《书法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3 期。

② 刘宗超:《“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研究与编纂刍议》,《书法研究》2001 年第 5 期,第 16 页。

年书法史作专门的观察,进一步发掘曾促发或制约这一转变的各种外在、内在的因素,以期更深入细致地了解 20 世纪书法史的历程。

选择怎样的观察角度才是合理、有效的,甚而是至关重要的呢?观察角度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能否抓住历史之脉;二是能否从对历史的捕捉和追寻中,生发出针对当下和未来的“智慧”。我们若想走近 20 世纪中国书法史,并因这历史而有所生发的话,“书学疑古考辨”应是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

首先,疑古精神、疑古思想是贯穿于百年书学史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是支撑百年书法进程的一大支柱!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疑古思想在各时代中或显或隐、或强或弱,至 20 世纪,疑古思想以其浩然声势,一跃成为学术文化界的亮点,尤其是 20 年代顾颉刚等史学家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和由此形成的“疑古学派”,更使“疑古”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对于书法界是否产生过作用?如果有,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于 20 世纪书法史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以往很少有研究者充分注意到这些问题,更鲜有人对此做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事实上,缺失了疑古思想的 20 世纪书法想要得以转变,是几乎令人无法想象的!“疑古思想”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转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代代先哲始终在质疑和反思古人的学术思想、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推动着学术文化的新陈代谢,同时彰显着自身鲜活的生命力和主体精神。书法的发展怎能缺少疑古精神、疑古思想的支撑和推动?当然,书学界的“疑古”与其他学术文化领域的“疑古”不尽相同,而各自的异同之处尤其是书学界疑辨的主要对象和产生背景等,正是值得梳理和寻绎的重要学术内容。

其次,“20 世纪书学疑古考辨”这一研究课题具有突出的当下性,即能为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的当下书学的发展提供参照,甚而给予一些重要的启示。

20 世纪末,学术界对于“疑古思潮”和“古史辨”进行了又一轮的集中讨论和反思,包括疑古思潮的形成和内在学理变迁、古史辨派的形成、学术成果、研究方法以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局限等,这是此时期学人在 20 世纪后半期学术嬗新的新视野下,对“古史辨”作出的观照^①。“古史辨”和疑古学派已成为一个代代学人无法回避、历久弥新的话题。那么,“20 世纪书学疑古考辨”这一课题的当下性又何在呢?——“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当是 20 世纪书学疑辨者身上最突出、最核心的精神特质,就当下的书学发展而言,书学界迫切需要、仍显匮乏的也正是此种精神特质。唯有更多研究者对传统书学认知自觉地以怀疑的目光重新加以审视,善于从中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时,书学界的学术进步才真正有希望,今后“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发现疑点、提出问题。通过考察 20 世纪书学疑辨的背景和疑辨内容,我们发现,种种疑点的提出和重作解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20 世纪中国新思想、新学术的启发和推动,尤其是与史学界的变革、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自然科学从西方的引进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从这一课题研究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必须注重书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以跨学科的视野来反观书法内部、外部的种种问题,才有可能开拓出更大的思考空间和发展空间。

^① 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 2001 年版;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笔者从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中延伸出的多方面较具体的思考,其中自然不无可再作商榷之处,但在此最想说明的一点,也是这一研究最根本、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对‘反思’的反思。”有学者这样评论现有的艺术史研究:现在“艺术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艺术史研究“该是理性的一个重要驿站:思想从这里出发或是经过,又返回或是通过这里……如此不断,艺术史才有可能真正地成为人文学科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毋庸讳言,现今国内的艺术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是相当单薄的”。^① 是的,“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正是牵引笔者撰写本文的一大内在动因。如果说“疑古”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思”,那么,本文对“20世纪书学疑古考辨”的研究或可称为:“对‘反思’的反思。”对于百年中不同书家、不同时期的各种疑古观点,文中尽量避免做是非曲直的直接评判,而是努力寻绎出由种种观点组成的或连缀或断裂的过程,更多地关心各种观点或观点群所映现出的“问题”,探讨观点产生和改变的原因、背景,避免孤立地看待“书学疑古”,这是“反思”时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20世纪书法史(书学史)”研究而言,也只有将20世纪的书学疑古置于时代学术思想的大背景下,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更真切地探知20世纪书学研究中的观念、认识及自身处境。因学识、眼界、时间等诸多因素所限,本文中的很多认识和结论仍不免粗浅和幼稚,权当抛砖引玉。

① 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概念界说和研究现状

史学界的“疑古思潮”、“古史辨”，诸多学人早已耳熟能详，并对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但要提到“书学疑古考辨”一词，恐怕会略感陌生。“书学疑古考辨”具体所指为何？它与史学界的“古史辨”有何异同之处？或有何关联？在此，有必要对 20 世纪的中国“书学疑古考辨”做一界说，以作为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在“书学疑古考辨”一词中，“疑古”是“考辨”的定语，它对考辨的范围作出了限定，换句话说，笔者所关注的不是 20 世纪书学领域的所有考辨内容，而是其中受疑古思想牵引、对传统书学认识和书学观念提出质疑的那一部分，尤其是针对经典性、权威性、广为人知的历史结论的质疑。“考辨”是方式方法，是证明新观点的手段；“疑古”是自觉的怀疑和批判，是考辨的原动力，在思想观念层面指导着书家、学者对考辨对象的选取和对考辨方法的运用。

需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讨论书学领域的“疑古”，须将其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史学界的“疑古”作一定的区分。首先，所疑之“古”：在时间上，是指与 20 世纪相对应的“古代”，即包括 20 世纪

之前的所有历史时期;在内容上,是指包含了书体、书家、书作、书法文献等在内的所有与书法相关的知识和观念。而史学界所疑之古主要集中在“上古史”。其次,“疑”的方式和表达途径:书家、学者主要通过著述对古代的书法知识和观念进行疑辨,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辨”等少数事例中,才有一批书家、学者以有组织的方式、成规模地高举“疑古”旗帜,并形成浩荡声势。与史学界疑古学派的大力宣传、疑古作为一种喷薄而出的“思潮”相比,书学领域的“疑古”相对是一种暗流涌动的状态。或正因为书学疑古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故未能及时进入诸多研究者视线之内,但我们不能因为表达途径或状态的不同,而否认书学领域疑古思想的实际存在和有待发掘的历史价值。

对“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这在书法史学史领域,就目前而言,仍是一个较新颖的研究角度。

首先,在本课题研究之前,很少有研究者将百年书学疑古作为一个专题来展开。部分研究者对书学领域“疑古考辨”的研究,大多只涉及少数的“点”,尤以对“兰亭论辨”的反思为主。例如王玉池《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中国书法》1988年第3期,后被收入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18卷《王羲之王献之一》)、毛万宝《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书法研究》1994年第4期)、陈振濂师《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的第三编第十九章、束有春《〈兰亭序〉真伪的世纪论辩》(《寻根》1999年第2期)等论著对论辨的展开过程、背景、存在问题和历史作用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2000年出版的《兰亭论集》一书,较集中地展现了书家、学者在20世纪最后一个时期对兰亭书帖的认识,《论集》下编收录了“1999年《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篇,其中丛文俊《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华人德《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论六